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光译

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札记



2.45
237



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札记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 著

竺

光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沈阳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4
第 二 章.....	18
第 三 章.....	26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39
第 六 章.....	51
第 七 章.....	57
第 八 章.....	63
第 九 章.....	72
第 十 章.....	80
第十一章.....	96
第十二章.....	107
尾 声.....	116

阿尔泰的八月末，是气温变化很大的季节。白天很热，太阳在天空中移动得很慢，茂密的庄稼散发着浓香，可是，刚刚日落西山，天气立刻就冷了。雾气笼罩着整个大地。无边无际的大片小麦随风摇摆。

到荒地国营农场来收秋的大学生们住的帐篷里人声嘈杂。晒得黝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挥动着匙子边吃边谈，并且彼此开着玩笑。国营农场场长同他们一起吃罢了晚饭，就问：

“面条汤好吃吗？”

“好极了！”有人开着玩笑说。“我们有三样好东西：寇克沙、拉普沙和罗克沙^①！”

帐篷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声……

场长临走时提醒他们说：

①寇克沙是当地的一条河名，拉普沙是面条汤的俄文译音，罗克沙是国营农场场长的名字。因这几个字的尾音完全相同，故引人发笑。——译者注

“明天你们要早起两个钟头，别磨蹭了，躺下睡吧……”

等到大家都静下来时，三年级的沙萨·布菲耶夫突然喊道：

“同学们！戈托夫采夫哪儿去了？要知道，他仿佛都没有来吃晚饭！”

“列米佐夫也不在！”又有人突然想来说。“他们出了什么事了吧？”

其实，这两位未来的教师——谢尔盖·戈托夫采夫和伊万·列米佐夫根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这一天，他们工作的地点离农场最远，当往回走经过树林的时候，他们无意中碰到了一座半坍塌了的窑洞，上面长满了青草。戈托夫采夫用肩膀操了一下门。门从生了锈的折页上掉了下来，戈托夫采夫就闯了进去。他脚底下的地板喀嚓喀嚓直响，还没有等他醒悟过来，就掉到潮湿闷人的地窖里去了。

“没摔坏么？”列米佐夫问道。

“伸手拉我上去。”

列米佐夫拧亮手电筒。地窖里空荡荡的，只见墙上挂着一个发了霉的旧皮包。

“喂，老兄，有人在这里藏了好东西……”

戈托夫采夫打开皮包，从里面掏出了用一条

有些发霉的细绳捆着的一大卷纸。

“好象是稿子，喂，照个亮儿！”

列米佐夫跳进了地窖，读了几行，就欢天喜地地喊道：

“这正是肃反工作人员菲多尔·布拉特琴柯的札记呀！就是此地博物馆的解说员对我们讲的那部稿子。人们还以为这部稿子已经丢失了呢。”

于是，他们两人坐到地板上读了起来……

第一章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作家在写正文之前，都要先把主人公的详细情况介绍给读者：他生在哪里，父母是谁，等等。既然这个札记里的主要人物是我自己，那就是说，该从我的身世写起了。

……有一个知识分子，是个教员，曾经和我一同蹲过伊尔库茨克的监狱，他读过我的一些笔记，他说：“菲多尔，您写的话太啰嗦，净是议论。最好能写得言简意赅……”我尽量照着这个高明的意见办，一句废话不说。

我于1897年出生在托姆斯克，家庭是……顺便提一提，这可算得什么家庭呀！我的父亲是非常可怕的，面孔由于经常喝酒而浮肿了，毛发蓬乱，胡子成团，两只大手活象两个耙子——我从小就怕他。一看到他，我就躲到楼梯底下去。有时我要在那里一直坐到从我们当时住的地下室的那个黑窟窿里传出他那响雷般骇人的鼾声为止。

我小的时候很瘦，小脖子精细，胳膊象麻秆似的，微弱的说话声活象小狗崽子叫。父亲不喜欢我，其实他甚至未必记得还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他在乌沙伊卡河上不直腰地给驳船装货，他一千完那苦活儿就拚命喝酒。母亲，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很严峻、很呆板，总是躺在床上，面孔阴沉得象一尊圣像……

1905年，我的父亲——加夫利尔·伊万诺维奇·布拉特琴柯一拳头把到码头上“镇抚”装卸工人的托姆斯克警察局长打死了。过了一星期，他们就把我父亲给绞死了……我真不懂事，为这事我甚至还高兴过——我早年过的穷苦生活就是这样阴暗，毫无希望。不过，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却仿佛使我过得比较好些了。

一家邻居收养了我。这一家人很稳重，也很平常，可是整个院子里的人家都把他們看成是神经错乱的人。丈夫和妻子都笃信神明，并且也让我到教堂去，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所以我从小就憎恨宗教。十五岁那年，我的养母叫我在睡觉以前祈祷，我发了脾气。我说根本没有上帝，至于圣像，那不过是涂了颜色的木板罢了。说完这些话，我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等着雷来把我劈个粉碎。但是，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只是她赶我。在一个钟头以后，我就背了个口袋出来了……

我在铅笔工厂当了木匠学徒。在这里工作的有好多是被流放来的革命者。我十七岁时就和地下工作者有了联系，十八岁就由于“参加暴动”第一次被捕了。我住在一个顶楼里，甚至都不能每天吃到午饭。穿的衣服也是别人穿过的。但是，我的精力却异常充沛。我幻想着要改造这个可恨的旧世界。

1916年初我进了“革命大学”，也就是进了监狱。这个学校可不坏。老同志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给我看。我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决定不跟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走，我要跟布尔什维克和列宁走。

我在监狱里就开始写作了。当时我试着作些诗。和我住在一个牢房里的人都夸奖我，我就更有劲儿了。我写过“悲惨的命运”，也写过“从顺从者和穷人身上吸血”的那些人。另外，我也写大自然，也写些我自己从未体验过的“蜜意柔情”……

那位教员就劝我写我自己的生活。“生活里有很多有教益的东西！”他说。“不论如何，总比写那些简单的诗好些！”可是这位好心的人不晓得，这些拙劣的诗后来却帮助我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由于我敲墙和隔壁的牢房互通情况，就把我弄到一个单人牢房里面去了。这个牢房设在一个圆塔里面。窄窄的枪眼大的窗户透不进一丝阳光。

我念叨着我写的那些诗，为了不致寂寞，我就讲给狱吏听。狱吏是个恬静的、好心肠的老头。由于我给了他精神上的食粮，他有时就往我那个牢房的监视窗里塞一些卷好的马合烟。就是这个狱吏，他在巡查的时候跟监狱长讲，说我有天才。

伊尔库茨克中央监狱的监狱长是一个老糊涂了的上校，紫红色的鼻子耷拉着，两颊上满是梆硬的青筋，大家都说他重感情。他一看见罪犯祷告就要淌眼泪。但是，尽管他在谈到敬上帝和爱同胞的时候也显得很激动，但却并不妨碍他照例采用肉刑，或者把人们投到禁闭室里去。

这位上校眨动着他那对红肿的眼睑，要我给他读些什么。我就读了些诗给他听。

“真不错哩！”他吧嗒着嘴唇，夸奖我说。

“以后你还要多多用功，因为在你打算改造世界之前，首先要使自己的内心作到和谐。”

“请允许我说一句，上校先生！”我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说道，“这里非常狭窄，又很少出去放风。我希望能恢复健康，请允许我出去干活吧！”

一般来说，这里只是叫那些被判处短期徒刑的罪犯由他们押解着去干活，一组五十个人或者七十个人，去修建监狱的澡堂子，或者去打扫空地。“政治犯”和未决犯是没有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的机会的。我很想到黑屋子外面去活动一下。此外，我还暗自打算和“外界”取得联系。

“出去干活？”上校眯缝起眼睛，直勾勾地打量着我。“唔，应该老老实实听话，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的方法，好吧！”于是他就吩咐狱吏说：“明天把他带到刑事罪犯一块儿去。”

听着这个老糊涂的、沙皇手下的专横的长官发表谬论是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老实听话！……等着瞧吧，等我从这里出去以后，我就给你瞧瞧我是怎样老实听话的！”我当时这样想道。

于是，我就干活去了。过程是这样的：把我们集合在监狱的一楼里，警卫队长是一个身材瘦弱，无精打采的准尉，他用鼻音下命令：

“五个人一组！第一组，向前三步走！第二组，第三组……”

点完了人数，士兵就拿起武器，端着准备射击的架子，把我们带到铺着碎石头的市广场。犯人都穿着一式的灰色水兵服，戴着扁帽，把冻得发红的两只手藏在袖筒里，慢腾腾地走着。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小市民一边咂着嘴，一边嘟哝着说：“无辜的受难者，为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祈祷吧！”一边就把白面包和煮老了的鸡蛋塞在伸出来的手里。“无辜的受难者”——这些刑事罪犯里有盗马的，有小偷，也有杀人犯——一边行

礼，一边接过来他们的施舍，嘟嘟囔囔地抱怨说：

“这哪是面包，简直是石头！哼，吝啬鬼！”

我发现，这些刑事罪犯大多数认为对于一般人的那种感激、同情等正常的情感表示鄙视才是好“风度”。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就是他们对人的“派头”。

警卫兵把我们带到了澡堂子。这是一个很矮小的建筑，已经修了两年多了，可是还没有上房盖。犯人们一点儿不着急，催也没有用。警卫兵把澡堂子围了起来，就坐下去抽烟。我们就开始干活儿了……

我一想到这种“活儿”就不能不笑。每个人都去干自己的事。有的把囚衣卖给走近来的市民，有的就拚命地斗纸牌，还有的人喝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酒，仿佛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冻得厉害了，就大声怪叫着，拿起瓦刀，疯狂地砌上一两行砖。然后就又休息了。

我和一个身躯高大、体格匀称、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在一起干活。他上身穿着一件下级军官便服，下身穿着紧脚口的宽大裤子。他叫伊戈里·马里宁。看起来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就是有点儿不知羞耻。第三天他就笑着跟我讲，说他曾给一个上尉当勤务兵，把他偷了个净光，因此才

来“蹲”三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那样的冷漠、凶狠，还有点惺忪的眼神儿。马里宁有一次对我说：

“小伙子，我们跑吧！”

他并且跟我说明了这次冒险的目的：

“找到我那个上尉，打死他，然后把他那个蓝宝石戒指摘下来卖掉，钱都拿去喝酒……”

我们拟定了一个很巧妙的逃跑计划，有一天，这个计划就实现了。我们把妙计又告诉了另外一个犯人，于是我们拆毁了浴室里的一堵墙，然后，由我们这位助手把我和马里宁“禁闭”到那里面去。我们要从里面弄倒这堵只有一块砖厚的墙，逃出这个禁闭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们俩就紧紧地靠在一起站着，这里面是黑洞洞的。我们俩粗重的呼吸声搅在了一起。手脚都麻木了，但是只得忍着。动一动都不行：这个小笼子太小了。隔着墙我们听到警卫队长命令道：

“五人一组站好！第一组过来，第二组……”

后来，外面就乱了。警卫兵来回直跑，在澡堂子里搜寻着，警钟也敲了起来。过了几个钟头，才一切都静下来。根据我们俩的估计，外面该是黑夜了。于是我们俩一齐推墙，砖就散落下去

了。

我们站了一会儿，贪馋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头上是黑魑魑的天空，天上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星。澡堂子的墙壁是漆黑的。突然，听到了尖叫声：

“举起手来，不然就开枪了！”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拿枪的士兵。他的眼神惊惶不定，声音发颤。他是留在这里守卫澡堂子，以防意外的。马里宁仔细瞧了瞧他，就低声说：

“老总，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你还记得不，我请你喝过酒呀？……你在我们身上能挤出什么油水来呢？放了我们，救两条命吧。你瞧，这小伙子是拥护真理的。正是为了真理他才遭了这个罪。难道你要和我们作对吗？”

“怎么，是由于撒传单把你抓来的吗？”那个兵士问我说。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吧，小伙子们，你们跑吧！我只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马里宁往前迈了一步，猛地转过身来，就把那个兵士手里的枪夺过来了。他举起枪来，一下就刺中了他。那个兵士勉强地呻吟了一声。

“你这是干什么？”我跑过去问马里宁，

“他已经把我们放了啊！”

但是，马里宁斜着眼睛轻蔑地瞧了瞧我，又走到那个倒下的兵士跟前，沉着地把刺刀插进了他的胸口。我立时害怕了：他也会那样不慌不忙地把我弄死的！于是我绕过墙角，就往空场跑去。

“站住！”我听到马里宁在喊。“你往哪儿跑？”

但是我并没有站下。我跳过了一道栅栏，跑过了一个穿堂院子，粗声地喘着气，在不知是谁家的台阶上坐了老半天。最后，我清醒过来了。我这才第一次感觉到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惋惜地想起了那个不幸的士兵，就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和马里宁这样的人交往。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没过三年，我们就又遇到一起了……

以后的事，我只简单地谈一下，然后就讲我写这个札记所要讲的主要的事情。我是在阿尔泰的克拉伊斯科赶上革命的。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个城市曾旋得旋失。在从前的商会俱乐部里开会的，有时是社会革命党人，有时是白匪司令部的军官，有时则是工农代表。城里到处是投机分子、窝主、无政府主义者和公开的匪徒。当地老百姓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们都被日夜搜捕和匪徒的袭击吓坏了。

又一次“政权换班”，索波列夫斯基将军的白匪哥萨克占领了这个城市。我接受了游击队司令部的任务，留在克拉伊斯科在白匪军队里对士兵做宣传工作。我不详细讲我的工作是怎样做的了，我只说在倒霉的一天，我正在兵营里念传单的时候被捕了。战地法庭审讯了我，判决绞刑，第二天早上执行。头天夜里就把我押在商会俱乐部的地下室里了。

我所以写出这点，只是因为我应当讲讲我同辽什卡·高里佐夫的奇遇。下面有好多地方我都要提到他的名字。

就这样，我被判处死刑了。他们把我痛打一顿，剥光衣服，只剩下贴身衬衣，就扔到地下室里去了。在头半个钟头，我还能想到战地法庭审判人员们的肥胖面孔和法官（军裤缝上带有饰绦的精瘦的哥萨克）一等上尉的没有感情的声调，还有领我走过的那条白皑皑落满初雪的克拉伊斯科大街。可是，过了一个钟头，我冻得直打哆嗦，甚至就连我要被绞死的事也忘掉了。我活象一个幽灵，就穿一身贴身衣服，光着脚在地下室里跑来跑去。洋灰墙和地板都复着一层毛茸茸的白霜，冷得哈气成团。就在这当儿，墙上突然闪出了一个人影。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穿着中学生的黑大衣。他的脸胖胖的，

双颊红润。他用手套掸掉身上的灰土，仿佛很随便，就象我们并非初次见面似地问我道：

“看样子，您是个布尔什维克吧？……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辽什卡·高里佐夫。我是从管子里爬到这里来的。”

“什么管子？”

“这所房子要安装排水设备，”辽什卡解释说。“管子都埋好了，但是革命开始了，因此这些商人先生们就没有弄好不冻屁股的厕所……您要我救您出去吗？”辽什卡压低了声音，闪动着顽皮的眼神，说道。“我从管子里领您出去，可以到市中心。到那儿我们可以从升降口爬出去。您很幸运：我在这里藏了些粮食，偏巧今天我到这儿来瞧瞧！”

“藏了什么？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懂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您说实话……”辽什卡沉思地说，“事情是这样，我要经过中国逃亡到美国去。一个自由的、有文化的男子汉是无法住在这个野蛮的国家里的！”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显然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以后再谈美国的事，现在你先救我出去吧。这可真凑巧，我刚刚被判了死刑。”